

甘做越剧百花园中一棵草

於泽锋

不久前,“越风韵韵”陈国良越剧原创作品名家演唱会在杭州萧山剧院举办,10位梅花奖演员齐聚杭城,为这位来自嵊州的“业余”作曲家助阵。

数十年里,陈国良创作了百余个作品,其中不少获得全国大奖。许多越剧名家凭借他创作的曲子获奖并被观众熟知。

一场演唱会,引来10位梅花奖演员助阵

在杭州拱墅区三塘兰园小区的家中,73岁的陈国良与笔者谈起9月24日那场历时3个小时的演唱会时,仿佛还沉浸其中。

演唱会上,这位在后台耕耘多年的老艺术家走到了台前。这是由陈国良的徒弟们组织发起的演唱会,共有24位越剧名家新秀参演,其中有10位梅花奖得主:华渭强、黄美菊、陈辉玲、张琳、王志萍、陈飞、蔡浙飞、方亚芬、王滨梅、吴凤花。

陈国良精心挑选了24个原创曲目,回顾了他几十年来的创作成果。在过去的数十年时光里,陈国良为这些越剧名家量身定做曲目,其中不少人凭借他创作的曲子获奖,比如蔡浙飞就是凭陈国良创作的《牡丹亭·叫画》获得梅花奖,而陈国良创作的折子戏《官人好比天上月》,让王滨梅百唱不腻。

正是这些经典曲目,成为陈国良和这些越剧名家交流情感、产生共鸣的桥梁。获悉陈国良要举办演唱会,大家纷纷到场,登台献唱。

陈国良1948年出生于嵊州,1964年考入嵊州越剧团。1981年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两年。1983年,回到嵊州后,他被任命为嵊州越剧团副团长。1995年,他调到嵊州越剧博物馆工作,1997年被借调到浙江文艺影像出版社。从此开启了漫长的编辑生涯,直至退休。

因为从事的是编辑工作,而非专业剧团的作曲者,陈国良自称是业余作曲家。在浙江文艺影像出版社工作期间,陈国良和社里约定,工作的同时,不能不让他作曲。出版社领导欣然同意,原因无他,陈国良在奔赴各剧团作曲的同时,也便于联络和收集资料,有益于出版工作。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由陈国良牵头,耗时8年编著而成的多媒体出版物《中国越剧大考》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华优秀出版物”影像奖,另一部著作《中国越剧大典》则获第十四届浙江“树人出版奖”。

与此同时,陈国良也在作曲上收获了成就与荣耀,赢得了圈内认可。截至目前,由他创作完成的戏曲音乐及电视剧音乐已达百余部。

百余作品,最钟情《九斤姑娘》与《牡丹亭》

越剧名家名段,绕梁三日,余音未绝。



陈国良(中)在自己原创作品的名家演唱会上。受访者供图

演出当天,面对数十位越剧当红名家,陈国良仍不厌其烦指导着他们的唱腔。对于自己创作的曲目,他如对待孩子般呵护,力求还原创作思想和其中蕴含的无限情感。

“这24个曲目,虽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但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算是对我创作生涯一个最好的展示。”陈国良说,筹备这样一场演唱会,人力物力投入很多,在结果呈现上,他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回顾自己创作的百余个作品,陈国良最满意的便是越剧《九斤姑娘》与《牡丹亭》。其中,《九斤姑娘》是为浙江越剧团创作的,获得了中国戏曲最高学术奖——中国戏曲学会奖。而《牡丹亭》则是他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量身定做的。

“在越剧的百年历史中,各种版本的《九斤姑娘》长演不衰,2010年浙江越剧团重新创作排演这部剧,把作曲任务交给了我,这中间,我做了很多探索。”陈国良说。

“在草根越剧《九斤姑娘》的音乐创作中,我查阅了现存的大量文字资料和音像资料,把越剧孕育时期艺人们所创立的颇具艺术特色的四工合调、哀哀调、吟哦南调和吟哦北调融入其中。”陈国良的这番尝试,不仅抢救保护了老腔老调,也使作品曲调原始纯粹,真切自然,极具艺术感染力。

为增强作品的丰富性,陈国良又融入了平湖调、莲花落、鹦哥戏等唱腔,这些或婉转或轻快的曲调,充分贴合了作品的人物和场景。

“演出之后,反响很好,北京的专家特地前来调研,召开座谈会。他们说,这个戏的成功首先在于音乐。对于其中的老调,他们之前没有听过,只在越剧史的记载中看到过,觉得新鲜生动。”陈国良说。

陈国良另一得意之作便是《牡丹亭》。“浙

良,这是你的稿费。’对于当时的我而言,真的特别感动。”陈国良回忆道。

“何占豪老师还谈到,作曲一定要找到戏中人物的闪光点,这样的曲子才有灵魂。这为我后来为傅全香老师创作越剧《李清照》提供了帮助。当时,我接到傅全香老师的电话,邀请我共同创作。我空着脑袋去的,心里没底,于是反复读剧本,最后在读到赵明诚死后,李清照祭拜亡夫,纸钱撒在空中的那一刻,我抓住了这个人物,‘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感觉终于到位了,这都是何占豪老师教给我的技巧。”陈国良说。

时至今日,陈国良和何占豪还保持着紧密联系,他时常去上海登门请教。“何占豪老师有个特点,他鼓励学生挑战自我,比如让我创作越剧交响乐,他会鼓励我写,大胆写。我在写的过程中,慢慢地摸出了一些门道。当时,何老师指着我的作品对我说,‘国良啊,你的《毛泽东与杨开慧》让我听着很感动啊。’这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分量不轻。何老师举办自己作品的音乐会,都会留一些曲目给自己的学生,展现学生的作品,由此激励我们不断提高创作技巧和创作热情。”

和傅全香结识,则是在陈国良任嵊州越剧团副团长期间。“傅老师有一次回嵊州,我们提出聘请她担任团里的艺术顾问,她觉得能为家乡的越剧事业出力,很开心,因而欣然同意。越剧《大义夫人》就是傅老师参与创作的。1990年,我们剧团的演员陈岚就是凭借这出戏,获得了‘白玉兰’奖。”陈国良说。

“和傅老师结识,剧团与我个人都受益匪浅。创作越剧《李清照》时,在上海戏曲学院后面那条街上傅老师的家里,我住了一个多月。傅老师家吃饭都是用小碗,第一次吃饭,我吃了三碗,她问我,‘小鬼,吃饱伐?’我说,吃饱了。她说,‘你肯定骗我。’第二天,她就专门买了一个大碗回来。傅老师在学习上很节俭,苹果买多了,干瘪了,她就泡在开水里,等到重新丰满了,再拿来吃。我说,苹果都这样了,丢掉好了。她说,‘小鬼,丢了多可惜。’那个时候,傅老师70多岁,已经名满天下。”陈国良回忆。

最让陈国良钦佩的是傅全香的创作态度。“为了写好《李清照》,傅全香沿着李清照南逃路线,从山东走到了浙江,一路走一路感受。李清照喜欢猫,她还专门买了一只猫来养。三年当中,她一直围着‘李清照’这一人物转,尽可能贴近这个人物。在创作过程中,从剧本到曲子,都仔仔细细地过问。她的这种创作精神和创作热忱让人很感动。”陈国良说。

两位名师,在他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陈国良倾注于戏曲创作的一生中,有两个人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位便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著名音乐家何占豪,另一位则是越剧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傅派创始人傅全香。

“我至今觉得非常幸运,他们的教导,让我终身受益。”说起两位恩师,陈国良难掩激动。

结识何占豪是在陈国良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期间。“他那个时候50多岁,是音乐学院系主任,他特别提倡‘老师挑学生,学生挑老师’的教育理念,擅长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更是直接让我们参与创作,各大越剧团有任务下来,他先让我们写,边写边改,边改边问,这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作品出来了,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国

胡子二三事

大家都知道冯谖为孟尝君谋划“狡兔三窟”的事。要说“狡兔界”,北京大学教师、诗人胡续冬,人称胡子,可以算是“狡兔界的战斗兔”,在“挖窟界”,胡子肯定也是“挖窟界的莫高窟”。

第一篇当然是胡阿家。搬到肖家河新家之前,胡阿家先后在北大南门19号楼,西门外的畅春园、蔚秀园,虽然都很小,但都是他最重要的窟,是生活中,他家有两位“女神”,还有家猫阿克黄,这里是最让他安心和开心的窟。他为她们写诗,照顾她们无微不至。

其次就是北大窟。胡子在北大待了30年,从本科算起,都三十而立了。在北大,他立了一个又一个窟,让不同的学子和朋友在窟里感受到不一样的趣味和机缘。比如:胡门弟子窟,五四文学社窟,通选课学生窟,草坪唱歌窟,湖北招生组窟,北大新青年窟……

当然,诗歌窟也很重要。胡子的诗人朋友罗列出来,几乎就是整个中国诗坛。西渡说有“另一个胡续冬”,他有无数个变身,这一点我深为认同,在诗歌这个大窟内,他又挖了无数小窟,自己在不同小窟内自由穿行,收放自如。

关于胡子的北大和诗歌的胡子,已经有很多人写了怀念文章,今天就讲两个我参与比较多的窟。

其一,巴西窟。把胡子扔到地球上任何陌生的地方,他都能挖出自己的生存之窟。在巴西利亚任教那两年,他不仅写了巴西专栏以及众多巴西诗歌,还掌握了葡萄牙语,结交了巴西诗坛众多诗人,包括像安娜·宝拉大妈这样的“野生诗人”。在他走后,巴西各界都在悼念他。

对于巴西窟,我和大家一样,都是看他专栏了解到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可能看的版本比大家更原始,“更胡子”。我一度是胡子专栏的编辑,胡子在巴西大概很闲,写专栏勤奋到没朋友,不等饭,总是有好几篇存稿在邮箱里。那时候,只有巴西专栏是一天不差,而其他专栏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那是MSN时代,北京和巴西利亚时差11个小时,我们下午6点组版的时候,巴西利亚是前一天上午,编辑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和他连线,这条连线非常必要,大家都知道,胡子喜欢创造各种“黄灿灿的词句”,而抱着字典工作的校对老师们可不管这些,一篇1000字的专栏,能给你画出800个圈圈和问号。

类似这些不可理解的“天书”要一一和胡子核实,改成字典中可以找到的词句,面对这样的编辑和校对,胡子每次连表情包都不够用,最后只好委托我编辑。好在那时候文章也不能及时上网,不然,胡子第二天肯定得找我“麻烦”。

2004年底,胡子从巴西回来,巴西专栏结束。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希望继续巴西专栏,一时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作者。编辑部最后决定,继续邀请胡子开了“浮生胡言”专栏,又写了一年多。之后,这两个专栏分别集结为《去他的巴西》和《浮生胡言》。

其二,胡门山局。2007年,我夫人成为胡门弟子,曾经的老朋友,一下子成了他的“徒女婿”,我儿子得喊他一声“师爷爷”。

那些年,我也天天往北大跑,和他的一众弟子们打打羽毛球,大汗淋漓后呼啦啦跑去蔚秀园小厨房饱餐川贵美食,饭后再打“红五星”或“三国杀”至深夜,最后从北京偏西北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偏东南的家。乐此不疲。

北大及蔚秀园周边的苍麓馆子,是胡子“胡吃乱想”的阵地,每每发现好食处,就吆喝着弟子们及“徒女婿”开胃,点菜自然不用操心,结账这事,也抢不过他,到后来,我俩只能偷偷装着假装上厕所抢着付账。

挂甲屯的“浙江小海鲜”一度是我们最频繁的吃所,只有到这里,我这个浙江海边长大的人,才轮到点菜的机会。这里没有菜谱,看着橱窗里的海鲜现点,做法也都是现自创。双安隔壁的川军本色,大钟寺的花溪米粉,牡丹园的食盅汤等,留下各种“胡吃乱想”的印迹。

那些年周末山局更是精彩难忘,另一位“徒女婿”冷霜也经常参加。在参加“胡门山局”之前,我也算资深驴友了,北京周边的山爬得差不多,但胡子对于这个爱操心的天蝎男,还是一手安排路线、交通、饮食等,像一个老领队一样操着各种心。“胡门山局”比较野生,没有装备,当天往返,不带登山杖,照样爬很高的山,我通常领头,胡子压后。这群“野生山货”在群山漫野中自得其乐,欢歌笑语。

翻检那些年的山局照片,感叹曾经这么年轻,笑得如此开心!

也许是地球“太无聊”了,已经无窟可挖,胡子决定去天堂挖一些窟出来,等将来我们这些朋友们再去的时候,好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个爱操心的天蝎男,心操得也太大了点。

胡子有一首诗《感谢信》,讲的是2010本命年他去白云观求签,求得本命神和值岁神,分别是张朝大将军和郭桓桓大将军,这两位明朝的小芝麻官不知怎么就混进道教六十位太岁星君队伍里了。搞了一年两位大将军签,果然一年无灾无恙,心神安宁。所以,写这首诗感谢他们。估计这会儿,他可能已经和两位大将军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呢。

李荣

最近,偶然的机​​会,又重新翻读《唐音佛教辨思录》,想到了自己复旦读书时的一些事。我们上大学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复旦中文系里有一位教授,名叫陈允吉。当时应该还算是中年的中坚力量,尚算不得中文系里的老一輩。他独擅把佛学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样就把唐宋那些名家以往多少被人忽略的有关佛学的背景以及

与禅僧之间的交往,看得更为清楚一点,在当时亦是一种创新。那一册《唐音佛教辨思录》,便是陈允吉先生的代表作。我那时在复旦读的是新闻系,记得课程中也有文学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好像是由新闻系请中文系的陈尚君来开的,他那时应该是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给中文系以外的系开常识课,一般都是由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如今陈尚君先生已是复旦中文系数一数二的知名教授,于唐文学更是独

有心得。而当时他上课的情形和讲课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楚了。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目,是请中文系的陈思和来开的。他应该比陈尚君年轻稍高一点,但当时亦只是年轻一輩,在巴金研究上,因为得到巴金先生本人和复旦中文系老资格的贾植芳教授的直接指点,已经有了《巴金论稿》这样的良好基础。而且他对于现代文学历史的贯通,功夫也下得充足,又特别拈出现代作家里日本留学生以及欧美留学生等群体来做深研与归纳,当时亦属新颖,这些都在授课里面有所反映,再加上陈思和先生的嗓音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至今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读大学时的那些事

我上复旦选择新闻系,其原因可追溯到高中。其实,我自小生活在祖父祖母家。祖父李金波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与名小说家周而复是同学。他们都是文学青年,散文小说都涉足。新中国成立以后,祖父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做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师。因为教学的关系,需要把当时一些如巴尔扎克等英法名家尚未有汉语译本或者虽有却是旧本的小说翻译过来,便自己动手来做。后来便陆续出版了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王妃的秘密》等译作,而且还把斯蒂芬·茨威格的那一大册《巴尔扎克传》又出了一个新译本,译篇漂亮,我至今还时时拿出来作为文字上的营养来吸取。此外,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祖父还与同事、名翻译家朱雯先生合译了一册加拿大有名的社会问题小说家阿瑟·黑利的《汽车城》,最初译稿书名是译作《车轮》,那校样上的勾勾画画,当时的记忆至今还保留着。

受了这样的家庭熏陶,自然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感兴趣。读大学选专业,当然应该首选中文系。但是高中毕业班时的班主任,十分了解我,知道我有点学究气,读中文一头钻进去,容易与社会脱离,便提醒我兼顾自己学问的兴趣与社会能力的培养。这样,比较了一下,自己便选定了新闻系,既是能够符合那个“兼顾”的原则,而且还有海明威等自己敬佩的作家来做可以仰慕的榜样。

不过,由于自小的熏陶强大得很,所以进了新闻系,对于中文系还是有点欣赏。好在比自己只大了一岁的兄长是在中文系,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中文系课程的不少情形。记得还曾经随他去旁听了中文系那时著名的教授章恒生先生的一堂课。根据如今依稀的记忆,章先生讲课的习惯似乎是两臂直撑在讲

桌上,眼睛下视着桌面,按照自己的思路一路地讲下去,只偶尔才抬起眼睛来看一看课堂的四周。那一次讲课的主题已记不起了,只好像其中讲到了李后主的那一首《浪淘沙令》的词,其中“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几句,不同版本字面上稍有出入:“莫凭栏”,一作“暮凭栏”;“无限江山”,一作“无限关山”。章先生似乎一时很有兴致,讨论了不同字面的一番比较。他似乎认为,“莫凭栏”比“暮凭栏”更有意味,因为“莫凭栏”是反着说,劝人不要凭栏,其实已是凭栏,却后悔如果不去凭栏就好了,这是“双重的哀感”。“无限关山”比“无限江山”好,因为对应后面“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一句,关山更有阻隔的意味。这些都已

是过了30多年的记忆了,是否准确,没有一定的信心。只是忆到笔到,聊且当作一种参考吧。后来,读新闻系到了高年级,要做一次“大实习”,我是选在了《新民晚报》,跟随的指导教师是复旦中文系毕业。一次中文系里委托报社做一个有关章恒生先生的报道,他让我去了。没有采访到章先生本人,但系里同事和学生说了不少有关章先生的事。回来便做了一篇短文,由指导员推荐给晚报的副刊《夜光杯》发表了,自己很是高兴。

说回到陈允吉先生,当时自己没有得到旁听他的课、稍窥视其警效的机会。只听得兄长上完他的课后随口道出的一些片言只语。印象最深的是说起他在课上提出了佛学中的一大问题:一阐提(断善根、不具信的人,也即极恶之人)有无佛性。虽然自己对于佛学没有什么研究,只是觉得作为世界的一大宗教,有了解的兴趣。那么,听得“一阐提”的问题,就觉得这一位教授对于佛学不止于